

文庫博物館專集（三十二）

严家其、高皋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指出：“内人党”冤案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发生的最大冤案之一。”

一、文革最大冤案之一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当“文化大革命”的恶浪在北京泛起之后，首先冲击到了内蒙古，使内蒙古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浩劫。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即有计划地开始对乌兰夫等蒙古族领导干部进行诬陷。华北局书记解学恭等人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报告，对于乌兰夫历来的讲话采取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手法，生拉硬扯地罗列了五条罪状，称“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一九六一年一月，为了让人们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范围不仅是历史上形成的，而且是一九三五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划定的，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实现的，为此，乌兰夫决定向内蒙古的各级干部印发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一举动竟被指为“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而且歪曲事实，说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是“当时党内教条主义者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发表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报告还诬陷乌兰夫“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发动修正主义政变”，还说乌兰夫“打击汉族领导干部，扫清推行民族分裂主义的障碍”，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解学恭等人这个“报告”精神的指导下，以揭发批判乌兰夫为中心发动起来的。这就是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打倒乌兰夫》的社论，在报刊上公开诬蔑乌兰夫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份子，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是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而谎称是“当代王爷”。这些耸人听闻的罪名，就是为了进一步迫害乌兰夫等一大批蒙古族领导干部，为滕海清等人在内蒙古的全面夺权制造舆论。

在揭发批判乌兰夫的过程中，把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奎壁，自治区副主席、党委统战部长古雅泰，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以及一大批蒙古族干部打入所谓“土家村”、“云家店”，捏造成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以后逐渐扩大，株连之广，实属惊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内蒙古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夺权斗争的全面胜利，即内蒙古山河一片红。中共调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出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成立大会上，滕海清大肆吹嘘夺权斗争的成就，进而诬陷乌兰夫等一大批蒙古族领导干部，还提出“深挖”所谓乌兰夫的死党和余党，扩大打击面。

二、“挖肃”运动及其迫害

滕海清既不学无术，又不懂民族政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打土豪，分田地”出身的武夫，唯一的本事是打人、整人、杀人。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很快发动了一场所谓“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运动，简称“挖肃”运动。这是内蒙古“文化大革命”进入另一个阶段的标志。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对文艺界发表谈话，讲了文艺界挖黑线问题。二十七日江青又在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步清理队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特务鼻祖康生说：“内蒙敌人是有很多的，有苏修的，有蒙修的，有傅作义的，内部有乌兰夫的。”并且面授机宜给滕海清这个忠实的走狗。

滕海清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明确提出在内蒙古进行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滕海清说“已经揪斗了一批乌兰夫的残党余孽，挖出许多叛徒、特务，以及重大政治案件线索。”“问题越揭越深，线索越揭越多，情况越揭越明。”“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挖黑线、清流毒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这六个需要把人为制造的“挖肃”运动，提高到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位置上，故一场灾难从此就开始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的社论说：“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十二日讲话发表后，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闻风而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以乌兰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发起了总攻击。这场以挖乌兰夫黑线为中心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清理阶级队伍和群众专政紧紧结合，汇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洪流。”这是对挖黑线运动来历及在内蒙古的重要性的说明。

四月十三日，滕海清在呼和浩特市军民大会上说：“我们正在开展的挖黑线肃流毒的人民战争，已经进入了向乌兰夫及其一切残余势力发动全线总攻击的新阶段。”他把“清流毒”改称“肃流毒”，这就是“挖肃”运动的来历。

四月二十三日，滕海清所控制的《内蒙古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煽动说，“发动全面总进攻，就是要在全区旗县以上的各条战线，一起出击，全面开花。斗争的重点是文教卫生、公检法和党政机关，其中公检法是重点。但是，既要狠抓重点，又要顾及全面。”可见，杀气腾腾，不可一世。把这场灾难性的“挖肃”运动推向了高潮。

于是，“揪叛联络站”、“揪乌联络站”、“揪哈联络站”、“揪黑手联络站”等“挖肃”组织，纷纷建立。

从江青到康生，经滕海清及其打手的精心部署，挖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再天，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朋斯克，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以及巴图巴根、博彦巴图、鲍荫扎布、木伦、义达嘎、巴图等一大批蒙古族领导干部被打入“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将他们渲染成为该集团的左一套班子，右一套班子，明班子、暗班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将内蒙古的蒙古族干部，无论是西部的，还是东部的，绝大多数都被打入了“乌兰夫叛党集团”。

三、假“内人党”搞垮蒙古人

由于毛泽东疑心蒙古人有二心，特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赴内蒙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内人党”事件，挖“内人党”不仅挖到了蒙古包，而且挖到了羊群里，使蒙古族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上百万人受到株连，七十至八十万人被逮捕和关押，近十万人被迫害致死。最后，一向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发现情况不妙，只说了一句：“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同时，将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降级为省军区，归北京军区管辖，又调六十九军、四十二军进驻内蒙古

，与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联合实施全面军管，名为抵御外敌，实为防止蒙古人暴动。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对滕海清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在康生的指使下，“挖肃内人党”便成为主要目标。

所谓“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文化大革命中简称为“内人党”。内蒙古历史上有两次“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蒙古人民革命党（即今蒙古国）以及冯玉祥等均派代表出席，其目标是实现自治。白云梯（国民党员）当选为委员长，郭道甫、包悦卿等当选为中央常委；共产党员吉雅泰、李裕智等当选为中央执委。后来，共产国际插手这一组织，清除了国民党人白云梯、郭道甫等人，故分裂为左、右两翼，分别投靠共产党和国民党。至三十年代中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名存实亡。

一九四五年八月，内蒙古东部的蒙古族知识份子和蒙古青年，第二次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部，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一九四六年三月，又改组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四月三日，在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上，以乌兰夫为代表的共产党势力得胜，归顺共产党的哈丰阿、特古斯等人都一个个升官晋爵，一些反对派遭到清算。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三”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乌兰夫是个汉化和俄化的共产党的忠实信徒，不会讲蒙古语，在中国共产党的导演下，依靠共产党的势力，分化瓦解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搞垮倾向于民族自决的政治势力，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为毛泽东打江山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后来，乌兰夫官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星上将、国务院副总理、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民委主任，还独揽内蒙古的党、政、军大权，红得发紫。但是，好景不长，这个早期投靠延安的留苏派、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最终被毛泽东无情地抛弃了。这颇具讽刺意味，历史就是这样愚弄人。

其实，说乌兰夫对抗党中央，要搞民族分裂，则是对他的冤枉。振兴蒙古民族的雄心壮志和民族气节，一点都谈不上，说他只会替共产党卖命，倒是一点也不假。

为了搞垮蒙古人，滕海清秉承陈伯达、谢富治和康生的指示，竭尽全力把“挖肃”运动引向了挖“新内人党”。滕海清及其打手们使用极其残酷的逼供手段，从曾经参加过一九四五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身上，寻找“内人党至今有地下活动”的线索，把哈丰阿、特木尔巴根、朋斯克等一批早期投奔延安，紧跟共产党的蒙古族干部说成是：“钻入共产党内，窃据要职的民族分裂主义份子、内人党。”并向林彪报捷。

为了让人们相信他们编造的谎言，把早已被公安部门认定的反间计“二零六案件”重新抛了出来，作为“内人党”存在的证据。

所谓“二零六案件”，即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内蒙古公安厅三处突然接获一信寄自集宁的信，信中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了由二十二名代表参加的“内人党”首届代表大会。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又召开了四十三名代表参加的“内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说该党有党员二千三百四十六名。

此信事关重大，内蒙古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由内蒙公安厅组成“专案组”负责

侦破。并连夜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国家公安部协助破案。中共还决定加强对有民族情绪的人士的盯梢和跟踪，暗中访查老内党成员的言论和行动，增派军队，暗布岗哨，等等。经过反复侦察，未能破案。最后的结论为：属于个别人的反间破坏活动。

当时，中苏交恶，形势越来越紧张，双方的特务也日见频繁。很难说此信不是KGB反间计。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所设的一个“陷阱”。因为在整个挖“内人党”的过程中，从未发现任何材料能证实这一材料是事实。

然而，康生和谢富治听说此一案件后，如获至宝，认为这可能成为搞垮蒙古人的“重型炮弹”，立即召见滕海清及其打手们，令其以此为突破口，打垮蒙古人。

滕海清正要杀气腾腾地打一场挖“内人党”的歼灭战时，却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高锦明从良心出发，反对再挖“内人党”。结果他被滕海清打成为内蒙古的“二代王爷”，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

四、一场恐怖的深挖“内人党”

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是挖“内人党”的高潮阶段。

滕海清在中共的领导下，深入挖“内人党”的第一线亲自督战。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他大肆叫嚣：“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来了。”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中共领导人给滕海清下了一系列挖“内人党”的指令。康生说：“军队里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这是埋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挖！决不能手软。”谢富治帮腔道：“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江青也煞有介事地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的”，“内蒙的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黄永胜接过来杀气腾腾地叫道：“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净。”这就等于明确告诉滕海清，让他把整肃的矛头指向内蒙古的党、政、军各级干部。

滕海清对北京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立即炮制了一份文件《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声称“新内人党是一九四六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份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份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我党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一九六零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发展时期……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组织。”

经过这样一番离奇的捏造，终于勾划出一个以乌兰夫为党魁的庞大的所谓“新内人党”。结果，把内蒙古地区几乎所有的蒙古族干部及知识份子都划入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新内人党”名下，进行了一场残暴的迫害。

滕海清陆续派出了大批的工宣队、军宣队领导挖内人党的运动，后又组织起北京及内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使用蒙骗的手法，驱使工人、现役军人、青年学生打头阵。他们采取逼、供、信的手段，又处处私设牢房关押。由于这些军人、工

人、青年学生大部分为汉人，所以整肃起蒙古人来一点也不手软。这样一来，一个空前的迫害狂潮就像洪水般地泛滥成灾。

为了配合这场恐怖的深挖“内人党”运动，滕海清还极力推广所谓的“伊克昭盟经验”，即对内人党徒决不可以手软，只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痛他们的灵魂。并且还推广了几十种极其残忍的酷刑。

滕海清授意和支持的这些法西斯组织，不仅可以私设公堂、任意刑求，而且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将抓来的人分给各单位关押，日夜审讯。一些受害者在逼供、诱供之下，屈打成招，乱咬乱供，把更多的人牵连进去。越扯越多，一时间人满为患，学校、工厂、办公室、寺庙等等都成为私牢。最后，大自军区司令、自治区主席，小至各中、小小学、幼儿园、街道办事处、农村公社和生产队、牧区蒙古包等等，到处都是牢房。

受害者在酷刑折磨下，出于无奈，编造假笔记、假文件、假党旗、假印章等。如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的白音公社的一位教师被迫交出“党纲十二条”，是逼供者故意放他回家伪造的；内蒙古军区一位军官不得已让妻子用孩子的红领巾假制了一个上面画有锄头和套马杆的党旗上交；伊克昭盟的一个受害者被迫伪造了一枚“内人党”印章，而所刻蒙文却不成字。经过一番折腾，挖出了一百多个内人党的变种组织。连草原上的民兵连也被打成“内人党”的变种组织，受害者被迫编造了一些组织名称，什么“井眼党”、“沙窝子党”、“黑虎厅”，等等，名目繁多，无奇不有。

在挖“内人党”的运动中，所有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有一些汉人也受到牵连。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都是家常便饭的事，还有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如在哲里盟曾有妇女被逼着与公牛交配；尚有两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两只灯泡。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惨状经历者不堪回首。断胳膊、断腿多是小意思。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之多，上致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等；下至普通农、牧民，甚至还有妇女、儿童。

笔者的一位朋友（现在美国）就是受害者，当年她只有二十四岁，为小学教员，住边远地区，但也逃脱不了关进私牢长达六个月的命运。她全家受到清洗，她的两个老师被打死。凡是蒙古族的精英或知识份子，都是主要攻击对象。株连的人数之多，殃及的范围之广，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中共的国庆节前，中共总理周恩来接到其侄女自内蒙古偏远的边境牧区寄来的信，说：有十几户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户不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为蒙古人喊冤叫屈。但是，挖“内人党”为中共统治集团有计划、有目的的血洗蒙古民族的重大部署，周恩来也不可能出面制止。这使七十至八十万蒙古人民蒙受不白之冤，遭逮捕和关押，上百万人受到牵连，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种下了蒙汉冲突的祸根。

这里顺便提一下，挖“内人党”不仅限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同时也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肃和东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区，只要是蒙古人，就难逃一劫。

五、“清理阶级队伍”另一种形式的迫害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活动。至于为什么要“清队”？清什么？怎么清？中共中央从未发过专门文件，作出任何规定和说明。所以各

地只能自行其是，没有统一的政策和标准。

在内蒙古，“挖肃”运动和深挖“内人党”，也被视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部分，只是变换了一种提法而已。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滕海清及其打手们又抛出了一份文件——《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份的几项规定（草案）》，全面否定了中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一贯政策，决定在牧区划分阶级、斗牧主，分牲畜。在牧区划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贫牧等两个阶级，六个阶层。牧主、富牧是牧区的剥削阶级。这是滕海清等人对中共阶级斗争哲学的一大发展。这还不够，又要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喇嘛中划分阶级，以喇嘛的学位来划分。真可谓千古奇闻！

凡是划分为牧主、富牧、封建上层、宗教上层份子的人，剥夺其公民权，没收他们的全部金银珠宝、大量现款、所有牧畜，冻结其所有的银行存款，直接归中共的国库所有。

林彪提出了一个歪点子，叫“政治边防”，强迫几十万蒙古人从边境地区向内迁徙，趁机向内蒙古大批移民。霎时间，翻天覆地，一片混乱。

为了扩大打击面，在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地区，尤其是在蒙古族农民中重划了阶级，使蒙古族的地主、富农的比例急剧上升。斗地主、牧主，分财产，极大地伤害了蒙古族人民。在宗教上，内蒙古境内的约一千五百座寺院被打、砸、抢，认为蒙古人信奉佛教就会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故要彻底砸烂。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足令闻者毛骨悚然。

在批斗过程中，通常蒙古族牧民、僧人都不會讲汉语，只能讲蒙古语。而滕海清及其打手们没有人懂蒙古语，于是，冲着蒙古人骂道：“讲人话（即汉语）！不许讲牲口话（蒙古语）。 ”

从前，蒙古族聚居区社会中，藏传佛教的庙仓经济占农牧经济的相当比例，召庙有自己的土地、牧场、矿场、牲畜，喇嘛拥有很多生产资料。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以“破四旧”的名义，对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进行了全面的破坏。他们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制定指标，要求在三、四个月内采取“逮捕一批、集训一批、劳改一批、动员还俗一批、入学一批”的办法，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

仅以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为例，一年中拆毁召庙十四座，大小殿房二十七栋，共三百四十八间。没有拆除的用作关押喇嘛和蒙古俗人的私牢。佛教文物被毁坏殆尽，珍贵的“大藏经”等经典被付之一炬。除亩产归公外，甚至连喇嘛的个人生活资料也被没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烂之后，佛头上巨大的钻石、红宝石等不翼而飞，即被那些目不识丁的军人所偷。

由此可见，“清理阶级队伍”如同“挖肃”、挖“内人党”一样，实质上是掠夺蒙古人的土地和财产，迫害蒙古人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六、蒙古族人民的愤怒抗争

由于“挖肃”运动、挖“内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旷日持久，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刑求方法也花样翻新，尤其在偏远的山区和草原，死亡和残伤的受害者不计其数。绝大多数人连“内人党”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却不明不白地成了内人党党徒；越来越多的所谓变种组织出现；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打成

“内人党”；挖“内人党”不仅从内蒙古挖到东北各省的蒙古族聚居区，而且挖到甘肃、新疆、青海的蒙古族中。蒙古族的许多传统活动和风俗习惯也被视为“内人党”的活动；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们觉得离奇。上百万人受株连，几十万人惨遭迫害，多少人又含冤而逝，使人们不得不思索，这是为什么？这个朴实、善良而又笃信佛教的骑马民族被激怒了。

蒙古人骑着马，冲破层层封锁，跑到北京，站在天安门前，默默地诉说内蒙古人民的冤情。最著名的是，内蒙古的“八百铁汉”，裸露着上身，将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的肌肉上，来到中南海（中共国务院办公厅）门前，苦诉内蒙古人民所受的灾难。引来成千上万的北京市军民，人们极为同情，暗骂共产党丧尽天良。

蒙古人怎么想中共中央、毛主席也不会允许如此迫害蒙古人。但是，他们错了。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并没有认错，授权周恩来起草了一份文件，只指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善良的蒙古人这是才发现，毛泽东的批示说明：中共挖“内人党”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内人党是存在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也是真的，清理阶级队伍也还是对的，砸烂佛教寺庙都没错。这是一场骗局！

于是，引发了更为全面、彻底纠正挖“内人党”错误的抗争，人们把矛头对准直接责任者——滕海清。工人、农民、牧民、知识份子、干部、学生、蒙古族、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上下下，形成了一致行动，批判滕海清的错误，一时出现了空前规模的批滕运动。

从牢里被放出来的人到处揭发牢中黑幕，实在令人发指。死亡者和伤残者的家属闹上公堂，要求报仇和抚恤。滕海清的打手们见势不妙，纷纷销毁黑材料和打人证据，然后四散奔逃。

蒙古人的愤怒之情，随着种种惨案的公布于众而日益高涨。到处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属举行的街头控诉会和刑具展览会，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高呼“向滕海清讨还血债！”“挖内人党是政治骗局！”还有许多死亡家属自发组织起来，起名曰：“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等等，都来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真是令人心碎。

结果，中共以“安定、团结”为借口，调滕海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正当蒙古族人民对所受迫害进行强烈抗争的时候，中共中央未经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最后，原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分之二领土被瓜分。

乌兰夫带领蒙古人干革命，为共产党卖命，结果，土地被瓜分，蒙古人无不痛心疾首，愤怒至极。这一决定，引起内蒙古进一步混乱。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古前线指挥所，统一领导内蒙古的工作。同时，把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降级为省军区，归北京军区管辖。又调六十九军、四十二军、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进驻内蒙古，用以对付蒙古人。

一九七零年一月八日，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所决定：现有党、政、军干部十九级（即科长）以上者，统统进入中共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洗脑子”

。该班的班长是中共的特务鼻祖康生，政委是江青，顾问为周恩来。内部纪律像监狱，学习班长达两年多，创下了“学习班”之最。

从表面上看压住了社会秩序，但蒙古人并没有屈服。这更增加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仇恨，对汉人的排拒情绪。这也成为后来蒙汉冲突的祸根。

□ 原载《北京之春》第32期（1996 / 1）

∞ ∞ ∞ ∞ ∞ ∞ ∞ ∞ ∞ ∞

康生与“内人党”冤案

• 祝力东 •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 引自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一）

一九六六年夏召开的那次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使前门饭店永远载入了史册。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身兼中央和地方党政军十几种职务的乌兰夫，突如其来地遭到激烈批判和围攻，会后便如陨星一般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前门饭店会议挑开了内蒙古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腥红序幕，它也是内蒙古十年烽烟的第一场政治戮杀。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天的时候，华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前门饭店开幕了。中央和地方的会议交错举行，毛泽东当时的用意是：以中央带动地方，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央终于批准撤销了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从此，乌兰夫被监护在北京，不能返回日思夜想的内蒙古了。

（二）

滕海清平素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而又暴躁，尤其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在内蒙古局势动荡复杂的情况下，中央派他来支左，真可谓人非其选。

此时内蒙古局势持续恶化。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康生把到京已经几天的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康生对滕海清说：“内蒙的敌人是很多的。”

滕海清随身带的秘书走笔如飞，一字不漏地记录着每一句话。

康生又说：“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用的人就知道了，奎璧、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二十八日中午，康生又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

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一九五五年授衔的中将。

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

滕海清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初冬的北京满目萧条。这两天，江青在北京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讲的是文艺界的“黑线”问题，江青说：北京的文艺界必须大乱。

当时，滕海清刚好回北京汇报工作，得到了一盘江青讲话的录音带，如获至宝，立即带回内蒙古。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一九四九年，组织上派乌兰巴干到自治区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经审查发现：乌兰巴干有过变节行为，但考虑到他当年入伍不久并且没有隐瞒，因此未按叛徒定性，只取消其侯补党员资格，转业到地方工作。

一九五八年，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又被选入建国优秀创作丛书，重排精装本，并多次重印，在当时广为流传。

乌兰巴干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几年之后，“文革”风暴平地而起，乌兰巴干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摇身一变，成了内蒙古文艺界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那时，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X X，在四处造反的形势下，也想立上一功。他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暧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巴干嗅觉很灵，感到其中有机可乘，便循迹而至。

他串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先把女演员关了起来，连续审问，逼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小说家使出看家本事，结合丁X X提供的材料，写写划划，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

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人党”的材料，这是第一次，同时，这

也是“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十一月二十五日，乌兰巴干手下的“掀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其实，乌兰巴干炮制这些材料的手段十分简单，无非是篡改历史——包括内蒙古的历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历史，把历史的说成现实的，比如捏造说历史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现实中还在继续活动等等。

那张所谓的《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也是这么来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北京，钓鱼台。

在八号楼宽敞的客厅内，灯火通明，窗幔低垂。这天夜里，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要在这里接见滕海清一行。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此时，内蒙古的“挖肃”运动已经遍地开花，被挖出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和内人党党徒成千上万。滕海清心里本来还在敲小鼓，怎么会有这么多阶级敌人呢？眼下，他听了康生和江青的话，心里增加了不少信心。

江青说完，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铎，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至此，康生一伙对挖“内人党”运动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中共地下党员。五十年代，郭以青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

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突然来找核心小组副组长高锦明。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二〇六”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八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干部。

高锦明听罢郭以青等人的汇报说：“内大又立了一功。”

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秘密逮捕上述八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炎热的夏季，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会议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三五一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他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

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当时，特古斯肺结核、胸膜炎复发，每天发烧，可是对他的车轮战昼夜不停，当他休克出汗，说不出话来时，便休息片刻，旋即再战。

特古斯实在支持不住了，答应写材料。他写了几十页，把全部历史颠倒过来，但涉及有关具体人时，仅限于老“内人党”范围，不几天，他又全部推翻了书面交待。

在突审特古斯期间，外调的专案人员曾找到抗战胜利后在东蒙地区工作的胡昭衡和张策，调查特古斯早年的历史情况。

胡昭衡、张策分别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和一九六九年四月写出书面证明材料。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氛围中，他们坚持原则，事实求是地陈说了那段历史，一致肯定了特古斯当年的表现。

苏尔原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特古斯揪出后，被指派参加了特古斯专案组。一九六九年二三月间，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张XX告发说，苏尔在一次上厕所进门前，摸了第二颗扣子，是特务联络暗号。于是，苏尔被隔离审查，关了半年时间。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经毛泽东批示的中央二十四号文件下达后，内蒙古地区开始为“内人党”冤案中的受害者落实政策。苏尔获释，重回特古斯专案组。

七月二十五日，苏尔和特古斯专案组的几个同志以及原宣传部干事高克林、就特古斯问题，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由高克林执笔。

在长达六千多字的报告中，他们如实地反映了特古斯专案的前后经过，指出“我们搞特古斯‘新内人党’问题，从开始到现在，是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还将张策、胡昭衡证明材料附于报告之后。

其时，在内蒙古军区领导机关中，受灾最重的要数军区政治部。

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是军内第一个“新内人党”，军队系统正是从他这里强行“突破”的。

鲍荫扎布在严刑之下，屈打成招，编造了他手下的“内人党”党员名单……。

骑五师战士郭建奇遭受严刑拷打，当抽打他到1600多次后，他申辩道：“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果然，他趁上厕所，就割肚剖腹，掏出了自己鲜红的还在微微搏动的心……。

伊盟盟委书记暴彦巴图被打倒后，遭受批斗共三百余次，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康生听过伊盟造反派的汇报后，说：“像暴彦巴图这样的坏人，是极少数！”

于是，由于康生的一句话，暴彦巴图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秋，是伊盟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第206期

~~~~~

【童年往事】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后悔一辈子的“革命” ——文革一件事

• 王燕燕 •

小时候，家住部机关宿舍，宿舍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儿。一进的院子，不深，东南西北屋，四四方方，中间有用碎石铺成的一条十字路，直通每家门口。

北屋住着商伯伯一家。商伯伯是原国民党的留用人员，毕业于北洋大学，是留下来没去台湾的为数不多懂技术的干部之一。为了表示对旧政府留用人员一视同仁，给了他一个行政十三级，若是共产党干部，这个级别够当副局长了，可涉及到权力问题，内外有别，职务只给了个正处，就让他管着别人操练不了的那摊纯技术活儿。娘家是绍兴人的商伯母瘦小精干，一口绍兴普通话，柔软动听，商伯母烧得一手好菜，还生了六个孩子。

商家大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平时住校，星期日回来，带着一副宽边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哥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很带劲儿。二哥远在东北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平日很少见，大姐小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外语念得我都跟着昏天黑地。接下来的二姐，学习有点欠火，她小学毕业后，只考上了附近一个特一般的男女混合中学。二姐时不时因为学习上的事挨骂。有一次，她挨了骂还嘴，气得商伯伯抄了通火棍，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商伯伯发火。二姐是我们一帮孩子的主

心骨，但凡我们和其他院子的孩子有什么纠纷，被人欺负了，都由二姐带队去讨伐。所谓三姐，只比我大一岁，所以不像前几位有尊称，我们直呼其名星星。星星很随和，主意不大配合极佳。商家老小，钢钢，亦是一付好脾气，乖乖的，讨人喜欢。

虽说商伯伯给压着不能当局长，活儿可没少干，其重要性也非常人可顶替。六十年代，家用电话还是个稀罕物件，商家桌上，已赫然摆一部在那里了。

东屋的贾叔叔常去用电话，他和爱人钱阿姨都是部长秘书，一对笔杆子，不是等闲人物。尤其是贾叔叔，逢部里开会，就是他发挥重要性的时候。我对这重要性到来的直接领略是一股沁人心脾的咖啡香气扑面而来。钱阿姨属于那种不是很漂亮但风度极佳的女人，出身资本家的钱阿姨会打扮，还会生活。几乎每个星期日，只要贾叔叔不喝咖啡，他们便集体修理一番，上公园去了。贾叔叔并非大家出身，他爸从山东老家来过一趟，忒土一老农民。可贾叔叔穿起笔挺的中山装，戴上金丝眼镜来，整个一地下党。这两口生了三个孩子，下边俩男的是双胞胎，老大是女儿，跟我同名，也叫燕燕。院里有人喊，我俩一起应着往外跑。后来大家只好直呼全名，冠以王燕燕，贾燕燕，以辨明正身。

住在南屋的我妈很少带我和弟弟去公园，她带我们去跳舞。妈是部机关的团委副书记，机关团委逢周末就在部五楼礼堂开晚会，有自己的乐队伴奏。妈的舞跳得棒，请她的人不断。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个舞迷，大约与这早期熏陶有关。妈妈忙，妈忙着组织活动，跳舞，郊游，演出，她忙的事我都挺感兴趣。爸爸也忙，他忙着每天晚上去北外上英语课。爸爸是被保送去学外语，同班的同学们，是一批为党所信任，准备委以外事重任的年轻人。爸爸专心学他的外语，和北屋的大姐一南一北，嘴里嘀里咕噜地振振有词。

西屋新搬来一家人，户主姓邵。矮敦敦的邵叔叔，是刚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营长。他家墙上挂着他跟程阿姨的照片，邵叔叔身着笔挺的军装，斜肩挂一授带，肩膀上扛的肩章是三星一杠，很神气。那时邵叔叔刚授衔，一脸的喜兴。到部里来工作的邵叔叔，少了许多在部队的威风。他的正营平衡到正科，部里衙门大，处以下都不算官，他只能在机关保卫处当科级干事。程阿姨刚从农村出来，身后跟着仨孩子，俩女孩子一律斜襟大褂，最小的男孩剃一秃瓢，背过去则有一撮毛留在脑后，农村叫老娘拽。有趣儿的是他们的名字起得很洋气，后来跟我最要好的大女儿就叫个丽娜。程阿姨没工作，像商伯母一样当家庭妇女。她不会做商伯母那样好吃的饭，不会打扮得像钱阿姨那样漂亮，更没有我妈那么多活动。她不大识字，又说一口山西话，俾得让人忍不住笑。

四家人的小院儿里，其乐融融。六四年，我入小学，再过一年，贾燕燕和西屋的老二也上小学，加上比我们大一点的星星和丽娜，院儿里的小学生们够半个班了。虽然东南西三家大人都是双职工，连程阿姨也去一家街道工厂工作了，但有商伯母在，大家都放心。我们每人脖子上挂串钥匙，放学回家先做作业，再一起玩儿。哪家大人晚上要加班，给商伯母打个电话，她就会帮着把头天的剩饭热热，要我们先吃。东屋的双胞胎和我弟弟都上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平时除了西屋的老娘拽，我们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我好事，爱当头儿，成天领着这一帮在院里乱窜。只要不吵架，不玩火，商伯母一般不大干涉我们。我们每天过家家，藏猫猫，跳皮筋，乐此不疲。到了周末更热闹，我属下多了仨兵不说，大人们也比平时闲在而宽容，因此可以跟大姐或我爸学两句外国话，对着乱吼，还可以把钱阿姨的高跟鞋和邵叔叔的大沿帽借出来过过瘾。吃过晚饭的人们满满坐了一院子，我们便演节目，小孩们唱歌跳舞朗诵完诗，更有商家大哥的故事和妈妈拿手的二胡独奏《良宵》，琅琅月光下，静静的一小院儿人，一幅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太平图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学校不能如期复课，孩子全成了散羊。部里为了让干部们安心闹革命，特从属下三个幼儿园紧急抽调一批老师临时组建一个少年活动站，以收容我们这帮调皮鬼。活动站离部里仅隔一个胡同，开始还有人用车把饭送来。后来说是食堂的炊事员要参加革命没时间送饭，改成我们自己去机关食堂吃。我们举双手赞成，没这规定前，我们也经常偷偷跑到部里去看热闹，现在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帮助大人闹革命”了。

过去秩序井然的机关已变成了大战场。无论推开哪个办公室的门。都可看见人们在忙着写大字报，印传单。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是撒传单，站在部楼顶平台上，手臂一挥，传单就纷纷扬扬地飘下去。行人们多会驻足而待，撒少了，还会看到人在抢。我们每天到机关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挨着办公室地看有没有传单撒。没有传单，我们就收集废传单纸，进而收集废纸。总之，纸上印的是什么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东西往下撒和看人们撒着欢地追着抢传单。一次我们实在没得可撒而手又痒痒，就跑到厕所里提着纸篓把一筐筐擦屁股纸从窗口翻将下去。

这天，我带着几个小孩，像往常一样走西串东地在部里转悠。转到西楼会议室，里面很多人在忙碌。已写好的横幅摊在地下，我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揭开隐藏极深的中统特务商某某的反动嘴脸”，这商某某就是我们院的商伯伯嘛，怎么一下会成了中统特务，我大惑不解。想看大字报吧，肚里那点字又不太够用。倒是漫画还易懂一些，角落里的叔叔刚完成了一幅。画的是一个人，轮廓很与商伯伯有些仿佛。无疑这就是他了。画上的商伯伯正抱着一节烟筒，很多东西从那里掉出来，他好像在哭，因为有一串小圈从他的眼睛直连到地下。

“小X，我看咱们的展览还缺点儿实物，光是大字报，漫画什么的，不生动。”

“是呀是呀，我们应该弄点其他的来辅助一下。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譬如说你这张画，说他把东西藏在烟筒里，我们要是找来一节，不就显得真实多了？”

“是呀是呀，我晚上回去就拿一节来。”

“咦，怎么要你从家拿，得到商某某家去拿么。”

“是呀是呀，那可能不太好吧。还没正式打倒嘛，再说，谁去呢。”

“这展览一办，他不倒也得倒。哎，这不是燕燕吗……”

“燕燕，今天我们可没有传单给你撒，你来帮我们准备展览吧？”

“什么展览？是商伯伯的吗？”我半懂不懂。

“什么商伯伯李伯伯的，以后你不能再这样叫他了，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他不喜欢我们共产党和新中国。你看，”叔叔指着面前那张画，“商某某总盼着有朝一日国民党会回来，他把中统上校的委任状等一系列变天帐藏在一节旧烟筒里，企图等国民党回来时邀功请赏……”。

一会儿的功夫，我不但受到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肩头还压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我带着贾燕燕和丽娜赶回家，像模像样儿地商量了一会儿。我们很有共识的是，第一，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早就警告过我们不要管大人的事，我们还得编一个谎，大家口径一致。要不然我们没法解释为什么大白天从少年活动站跑回家来。第二，从明天开始，谁也不许和商家孩子玩。第三是怎么拿烟筒呢？时值夏天，所有的烟筒已经在春天撤火炉时洗干净，用旧报纸包好，几个一捆地吊在厨房的梁上了。

还是丽娜细心，商伯母不是有一节生火时拔烟用的短烟筒吗？但商伯母似乎一天到晚在厨房转游，怎么能把烟筒偷到手而又不让她发觉呢？这事看来只能智取。

我先喊钢钢来，说我才学了一手变魔术的游戏要教他，他来了。我们正玩得带劲儿，贾燕燕那娇生惯养的小姐脾气犯了，不断找岔，专跟钢钢过不去。我一通乱劝，她们哪里听，只好去喊商伯母。小孩打架是常事，商伯母一点不怀疑就上我家来了。趁她劝架，我站到门口给早就等在那里的丽娜发信号，只见她兔子般地钻进商伯母的厨房里。本来以为两分钟的事儿，不想那天商伯母把常用的烟筒放在哪里了，丽娜半天也没出来。这边的事端平息后，商伯母已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下面她准要问我们为什么跑回家来了。我急得乱给贾燕燕使眼色。平时也没怎么见她特聪明，可别提那天多灵了。我的鬼脸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她已逼着嗓子大哭起来。商伯母被她这手吓了一跳，忙不叠地问到底怎么了。终于，看见丽娜像个怀了孕的女人一样腆着肚子从商伯母的厨房钻了出来。我一边遮住丽娜，一手拉过贾燕燕，不顾商伯母的喊叫，一溜烟儿地跑出了小院儿。

送烟筒的时候，我们成了英雄。

我的英雄梦没有做几天便开始了以后的恶梦横生。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被一片嘈杂声吵醒，爬起来一看，妈妈正把门帘撩起一点往外看，从缝隙中我可以看到北屋的灯亮得刺眼，很多人出出进进。我打了一个激凌：

“妈，他们是来抄家吗。”

“小孩子，你不懂大人的事，快回去睡你的觉。”“你也别出去，说不定……”后边的话是妈在说爸。

我当然睡不着，躺在床上翻饼，耳朵竖着听外面的声音和捕捉着妈妈爸爸的悄悄话。原来前两个星期前商伯伯局里的造反派已过来了，他们还比较文明，文明到我都不知道。现在这帮人是下面来部里串联的红卫兵，他们看了展览，觉得不满意，尤其看了那节烟筒，认为商某某肯定老奸巨滑，家里一定还有货，于是就自己来了。

北屋的声音越来越大，叮叮当当桌椅板凳被碰倒了，有人在叫。我又爬起来，发现妈妈已经出去了。我也钻出去，躲在葡萄架下，贾燕燕和丽娜也藏那里，我们互相看了看，心里都扑扑通通的。商家屋里乱七八糟的，有人还在翻箱倒柜地找什么，几个小伙子正在声色俱厉地让商伯伯跟他们走。

“这么晚了，让他明天去吧。”商伯母声音颤抖地求他们，她头发乱蓬蓬的。

“不行，不行，赶快走。”有人来拽。

商伯伯衣衫不整，面色苍白，“我的问题老早就交代清楚了，什么也没隐瞒，你们还让我交代什么呀”？



“别废话，你老实跟我们走”

“你们要把他带到那里去呀，他有血压高，经不起呀。”

“闭嘴，你想包庇你丈夫吗，特务老婆，”又有人上来拉，干脆是几个人开始拖着商伯伯往屋外走。商伯伯拚命挣扎着，他的手在空中乱抓，像是希望捉住什么东西。商伯母可能想伸手去拉商伯伯，还没靠近，就被人蛮横地甩开了。大哥二哥不在家，大姐到这个时候好像也傻了，她嘴一张一合的，想要说什么可说不出来。二姐冲出来，“你们怎么可以动手，他们都有病。”她说着就去掰那拽着商伯伯的手，星星也冲了上去，人们扭做一团。

“你们想干什么，敢干扰我们的革命行动，商某某，你敢怂恿你女儿跟造反派对立，你胆大包天。”

“要文斗不要武斗，”二姐被人拖到一边，摔在地下。

“要文斗不要武斗，”星星也喊。

“一家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都带走。”

“她们是孩子，不懂事，求求你们放开她们吧！”商伯母哭着去拉那还架着星星的人。

“毛主席呀，共产党呀，你们管一管呀！”商伯伯突然爆发出一声喊，那似哭像嚎的声音又厚又厉，把我吓呆了。我听见了大姐二姐的哭声，星星的哭声，还有钢钢的哭声。

“这孩子太小，别吓坏了，”是妈妈的声音，钱阿姨也在旁附和着。

“回去回去，没事的都回你们自己家去，想当保皇派怎么的？”

“你们有革命觉悟没有，你们的孩子都知道跟商家划清界线，大人倒是非不分了。”

乱哄哄中，妈妈抱着钢钢过来了。看见我居然站在院子里，就用另一只手把我也拽住，两步便进了家。黑古隆冬的，妈也不让开灯，她一边给钢钢擦眼泪，一边安慰她，“钢钢不怕，今晚上你就和燕燕睡”。

“走，架着他走，装死也不行……”，外边人仍在喊，我把耳朵堵起来。

那天的夜显得很长，钢钢先入睡了，两行泪痕还在脸上清清楚楚。我也哭了，说不清是怕，是惑，还是悔。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一天两天能说得完了。总之，商伯伯那晚没死，但从此进了学习班，不再回来。没多久，爸爸也被揪出来了，我自己也成了黑崽子。

一直没有笑声的小院儿到了六九年林彪下达一号命令时彻底分崩离析了。西屋的邵叔叔其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自然是留守部里抓革命促生产的最佳人选。他从小院最先搬出去，搬进离部最近的一栋楼房。东屋贾叔叔因为反戈一击有功也留在部里，钱阿姨一个人去了干校。北屋的商家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去兵团的去兵团，去插队的插队，只剩星星和钢钢。商伯母从商伯伯被揪出来后，一直病着，躺了很久

一段时间。人来动员她离京，她总是喘喘地说：“让我死在这里吧，我活不了几天了。”我们家最彻底，一个不剩地去了河南干校。直到爸爸病入膏肓的时候，才被恩准回京，没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千辛万苦再回到北京后，我曾带弟弟又回过一次小院儿。小院儿依旧，但已物是人非了。一帮小孩用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们。

“这院儿里有姓商的吗？”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地问。

“商奶奶，商奶奶，有人找”，小孩们一窝蜂似地往北屋跑。不知怎的，我突然一阵心悸，没等人出来，拉着弟弟仓皇地离开了。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第217期

∞ ∞ ∞ ∞ ∞ ∞ ∞ ∞ ∞ ∞

我从十一岁开始吸烟  
——为“文革”三十年而作  
• 刘晓波 •

关于“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奇观，人们争论最多的还是成年人和红卫兵的种种作为，几乎很少有人涉足“文革”中孩子的生活。籍此文革三十年之际，我想从一个小学生的抽烟精力来审视这场运动，或许能为人们提供些许独特的资料和另一种视角——小学生抽烟，也充满着等级特权和阶级斗争哩……

◇ 孩子得以挣脱学校和家庭的束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端的一九六六年，正是我长达三十年的抽烟史的开始。我对烟的感情，始于好奇，中经冒险和叛逆，终成一个瘾君子。

那时我十一岁，小学四年级，还没有资格与大人们、哥哥们一样带上红袖标，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只是大辩论、大字报、批斗会、武斗、大串联、打砸抢的看客。两个哥哥去北京串联时，我的死乞白赖的请求被他们轻蔑地拒绝了。当时的我，只能悲叹自己晚出生了几年，没有赶上成熟的年龄，徒然错过了激动人心的大好时光。但是，不能轰轰烈烈的孩子并不能置身于阶级斗争的整体氛围之外，也会因一些小事而被卷入革命之中。学校停课，父母忙于革命或疲于被革命，很少有时间光顾我，这使我在一段时间内得以摆脱学校和家庭的双重束缚，充分伸展孩子的天性，沉浸于自己所创造的游戏之中。回首“文革”，记忆中充满了新奇、刺激、亢奋、野蛮、残酷和无拘无束。人的破坏性本能、虐待狂本能和陷害他人以求自保的本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能量长期被压抑的火山喷发了，吞没了一切，每个层次的人都有自己的革命对象。作为孩子，我所要反抗的就是老师（公共权威）和父母（私域权威）。而抽烟恰恰是此种反抗的发端。

◇ 人分三等，烟分三等

小学生抽烟在任何时代里都会被大人们视为劣迹，但是在“文革”中，孩子抽烟就不仅仅是品行不端，更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而我恰恰又是在“文革”开始时学会了抽烟。“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号召停课闹革命，不仅大学和中学，就连小学也必须响应这一号召。我所就读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宣布停课三个月，老师们革命，学生们放假。我第一次抽烟就是在学校停课的那天下午，抽的是众多的吸烟者望尘莫及的高级香烟“牡丹牌”。这种烟在当时仅次于“熊猫牌”和“中华牌”，属于高级香烟中的第三档次。据说，“熊猫牌”香烟是特制的，只

供极为有限的几十个最高领导人享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也没有市场标价。“中华牌”香烟六角钱一包，供省部级领导人享用，要特供票才能买到，一般的商店里见不到这种烟，只有到特供商店才能买到。“牡丹牌”香烟五角一分钱一包，是供一般高级干部（中共规定行政十三级以上为高干）以及一些知名的专家、教授享用的。再次之的是“大前门”和“凤凰牌”，四角钱左右，也属于高级香烟之列。这些高级烟的显著标志是用银色闪亮的锡纸包装，都要凭票供应，一般的家庭只有在过节时才能买到一两包。在当时的长春市，中等偏上或中等家庭的人一般抽“大生产牌”或“迎春牌”，价钱在两角钱到三角五分钱之间；下等家庭的人抽一角四分钱的“握手牌”或一角五分钱的“代代红牌”；社会最低层的家庭或抽八分钱的“经济牌”或抽叶子烟。在我们这些抽烟的孩子中，烟的好坏决定着抽烟者在群体中的地位。“经济牌”当时被戏称为“八分损”，抽这种烟被别人瞧不起。从这种烟的分类档次上看，当时的中国已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了。这种等级观念也直接影响着孩子们对贵贱的意识。由于高级烟作为高等人或权势者的标志而极难买到，就自然要形成贩烟黑市，高级烟的奇缺和它的等级特性使之在黑市上的价格常常高出市价几倍。有些孩子就是为了在同学中显示其高人一等，竟不惜以非法手段弄钱到黑市上买高级烟。

#### ◇ 将军的孩子有吸烟的特权

我抽的第一支烟是一个绰号叫“大胖”的同学给的。他爸是少将，属于高级干部之列，住在长春市同光路的一幢独门独院的小红楼里，上下两层，有七八个房间，院子里种有各种花草树木，有保姆洗衣做饭，有勤务兵清扫门庭和警卫。“大胖”倚仗他当将军的父亲，在班里经常胡作非为，老师和校方也奈何他不得。他惹出再大的事，只要他爸爸的小轿车一到，校方只能笑脸相迎。我和“大胖”同样抽烟，一起被同学告密，他安然无恙，而我却要在全班作检查。由此可见，中共之特权的滥用，绝非始于今日的改革开放。在五十、六十年代，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一间学校根本惹不起将军之子。“刑不上大夫”不仅庇护着当权者本人，而且荫及子孙。

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宣布停课的那天下午，神色慌张而沮丧的班主任刚刚走出教室，“大胖”便跳上书桌，从兜里掏出印有牡丹花图案的红色烟盒在半空中挥舞。他的目光咄咄逼人，发问的口气不可一世，充满了挑战的意味：“谁敢抽烟？这是我偷我爸爸的。牡丹，五角多一包，高级烟。谁敢抽？老子白送。”大多数同学没有理他，收拾书包，离开教室，留下来的几个人都是平时的淘气包，我就是其中之一。“大胖”潇洒地分给我们每人一支，然后掏出打火机，给每个人点燃。我有些胆怯，非常谨慎地抽了一小口，除了觉得有点呛人外，并无其他乐趣。“大胖”见我们吸的窘状，便给我们作示范，怎样夹烟，怎样吸，怎样吐，怎样玩吐烟圈。“大胖”的烟圈吐得非常好，大而浓的烟圈可以一直滚到天花板，小而精巧的烟圈可以一个接一个地从嘴唇间弹出，不能不令我们这几个孩子惊奇、佩服。我学着“大胖”的动作，强压住咳嗽，尽量做得维妙维肖。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和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抽烟，在厕所、在角落、在街旁、在野地，我学会了一口咽下所有的烟，学会了吐各种烟圈，学会了把一个烟头全部抽光，也学会了为抽烟而撒谎、骗父母的钱、偷爸爸的烟。

#### ◇ 小学生抽烟——阶级斗争的表现

然而，在那个争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革命时代，任何超出红色标准的行为、言论、思想和作风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小学生抽烟自然被划归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即使不是彻底堕落，也是受了阶级敌人的腐蚀和利用。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了，已经走到了资产阶级泥坑的边缘，再不回头就会陷进去而无力自拔，成为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的俘虏

。的确，大凡抽烟的孩子都有几分流氓气，经常与旷课、打架、戏弄老师、抢军帽、抢纪念章、偷东西、拦女孩子等劣迹相关。这些行为至多属于品德败坏之类，无论如何与阶级斗争搭不上界。然而，当时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扭曲了人们对生活的价值判断，一切都是用阶级斗争的尺度来衡量，小学生抽烟自然也是两个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之一。

#### ◇ 我因抽烟而被批斗

无拘无束的自由时光随着“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而结束。重新返校，顿觉一片壁垒森严的肃杀之气。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公检法被砸烂后，代之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能够进入群专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出身好，革命觉悟高。“群专”的组织方式效仿解放军，分成连、排、班，统一吃住在学校，进行各种准军事训练，在“工宣队”的指挥下，负责对敌人的专政和维持纪律。“群专”在学校里的权力甚至比公安局还大，他们可以任意搜查、审问任何一个可疑的对象。同时，“少先队”也被“红小兵”所取代，红领巾换成了臂章。为了纯洁校风，我所在的小学，实行搜身制度。早晨上学时，“群专”的人站在校门口检查每个学生，不仅检查风纪（如衣扣一定要扣严，书包一定要斜挎肩上，穿夹克的要别针把领口别严，帽子一定要戴正等等），而且要搜遍全身。一旦搜出小刀、弹弓、黄色书（小说之类）、香烟之类的物品就统统没收，送进学校开办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展览馆，和那些走资派和地富反右坏的变天帐、毒草文章等赃物一并供人参观，教育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用香烟之类的糖衣炮弹腐蚀下一代。同时，被搜出赃物者，认错态度好的要写检查，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态度不好的要开批斗会。批斗会的规模视罪行的严重程度而定，大致分为四级：一级为班级批斗会，二级为年级批斗会，三级为全校批斗会，四级为几校联合批斗会。有犯罪者在批斗会要低头认罪，批判者要咬牙切齿，每个批判者发言完毕时都要高呼口号。这些程式的处理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那些屡教不改者就要实行专制，犯罪者被“群专”抓去拘留审查，关进“群专”监狱，每天叫家人送饭。关押时间的长短视被关押者认罪态度而定。被关押期间犯罪者不仅要忍受轮番轰炸式的审问，还要忍受体罚、毒打。因为一旦被定为拘留者，矛盾的性质就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革命者不再视之为可挽救的犯罪者，而是视之为不可救药的阶级敌人，是罪犯。当他们认为犯人已完全认罪，下决心痛改前非之后，就以一个大型批斗会来结束犯人的拘留生涯。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因抽烟、打架、旷课而做过多少次检查和被关过多少次批斗会了。

#### ◇ 父母这样对待我的抽烟

如果说抽烟在学校里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动向，那么在家庭中小孩子抽烟则被视为学坏的开始，父母对此非常警惕。我爸爸抽烟，但是他认为抽烟是成年人的当然权力，小孩子抽烟则是品行不端，一旦发现，必须及时纠正，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父母发现我偷着抽烟，很少和我讲阶级斗争之类的大道理，他们的方法简单粗暴，非打即骂。最难受的是他们要反复追问烟的来源。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这种连诱供带威胁的审问就会永无止境，直到问清楚为止。第一次被妈妈发现我抽烟，是她嗅出了我身上的烟味，接着又从我的文具盒里翻出了半截烟。妈妈当时的愤怒令我终身难忘。她先是声色严厉地盘问，见我不说，便抄起扫帚劈头就打，打了几下，我仍然沉默，她竟扔下扫帚，抄起钢筋作的炉勺子。情急之中，我奋力向妈妈一头撞去，她被撞倒后，我便夺门而出。那是冬天，我自知这下铸成大错，回家肯定要挨顿暴打，于是决定不回家。瑟瑟寒风中我四处游荡，直到天黑了，我冻得受不了了，才躲进储存过冬大白菜、土豆、萝卜的菜窖里。事后妈妈说，当她和爸爸在菜窖中找到我时，我像只小狗，蜷曲着身子，盖着草袋子，头枕一棵大白菜，睡得很死。从此以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妈妈都要搜查我的衣兜和书包，让我张开口嗅

我嘴里的气味。而我也自有应对的方法。回家前拼命漱口或吃几瓣大蒜，进家门前先把烟藏在某处。再后来，我插队成了知青，回家也可以公开抽烟，学校和家庭的双重束缚彻底摆脱了。当爸爸第一次给我抽烟时，我的心底里突兀地升起一种解放感，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父爱。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七日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 1996 年 5 月 （熊毅植字）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吴 放（美国） <[cm-ee@cnd.org](mailto:cm-ee@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美国） <[cnd-help@cnd.org](mailto: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ord@cnd.org](mailto:cnd-cord@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manager@cnd.org](mailto: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ftp.cnd.org)[149.159.2.6]：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